文艺老兵周巍峙

周振华

周巍峙，是继郭沫若、周扬、曹禺之后的第四任中国文联主席，任期两届。十年来，他不顾耄耋高龄，以党的文艺事业和中国文联工作的发展为己任，不辞辛劳，不遗余力，呕心沥血，尽职尽责，做了大量工作。他带领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开展各类学术研究，领导主持了中国十部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抢救、搜集、整理、编纂工程，热心支持“抢救和保护中国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工程”“中国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全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并积极参与“晚霞工程”“彩霞工程”“朝霞工程”及“百花迎春——中国文学艺术界大联欢”活动，努力推动文艺队伍的建设，使中国文联的工作呈现出崭新的局面。周老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音乐家，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写出了大量革命歌曲和合唱，创作和参与创作了《两年间》、《相信谁》、《八路军和孩子》、《不死的老人》等歌剧。特别是他创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更是抗美援朝时代的最强音，为他赢得了世界声誉。周老是优秀的学者、编辑家，早在一九三六年，就编辑出版了《中国呼声集》，影响很大。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他和中国著名文艺家一起倡导和主持了十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编纂出版，其中《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和《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由他担任主编或副主编。他主持编辑的《聂耳全集》、《冼星海全集》、《田汉全集》、《夏衍全集》等优秀作品，都获得了社会上的广泛好评。他主持和参与创作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国革命之歌》，成为二十世纪中华文化艺术的经典。

周巍峙，这位饱经风霜、已是九十五岁高龄的长者，出任过共和国的文化部代部长和文联主席，这样的身份和地位应该是很显赫了。但在他长达七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总是以一位老兵的姿态对人对事。他习惯周围的人称呼他老周、周老或巍峙同志，包括所有跟过他的秘书们，也不要喊他的官衔，这样他感觉亲近、亲切。

周老爱党爱国，对祖国和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的一言一行都在深深感染和影响着周围的人，他的身上总有那么一种亲和力和感召力。

周老长我近半个世纪。虽然我们的年龄相差悬殊，但彼此的交情很深，是文学和艺术把我们牵到了一起，并成为了要好的朋友，以至无话不谈。

有这样一层关系，周老每年都要来北京昌平几次。他关注这里新农村的建设与变化，关心昌平的文化发展与未来，关怀昌平文联的建设与创作。他习惯来基层文联走一走，看一看，问一问。问的最多的是文联的发展，最近的文艺活动多不多？文学艺术的创作成果怎么样？周老每次都是很深入很细致地了解基层文联的工作状况和当下百姓对文艺的需求。而后，留下他针对基层文艺工作提出来的一些宝贵意见和建议。

周老虽然退休了，但依然很忙。他硬朗的身子骨，智慧的头脑，决定了他总也闲不住，全国各地到处请他出席活动，他有求必应。如果不外出，每年秋天的时候他一定要来昌平几天，他认为这算是他退休后下基层的调研吧。他喜欢京郊的田野，喜欢农家飘香的果园，喜欢农民为收获而忙碌的场景。他对挂满枝头的大苹果、大柿子特别感兴趣。每次走进果园，他都是那么的兴奋与欣喜。我说您也来采摘几个吧！他摇摇头，打个手势，不用，不用，看着就好。于是，我们为他搬来椅子，他坐在果树下，仰着头微笑着和农民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他总问，农民的收入比上年怎样？当告诉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当下的果农家里都很阔，有的家庭还拥有小轿车，还外出旅游呢。他听了这些，无比高兴，赞叹如今农村的好日子。

周老言辞幽默而富有哲理，他不喜欢夸夸其谈，言而不实，作风轻浮。更不喜欢本事不大，谱儿摆得很大的人。他说做人一定要低调，本事要体现在才华上，而不是你的傲气和自满，做人只有低调，你的空间才会大，回旋余地才会大，才能换来周围的人对你的尊重。

我与周老的相识，是在二〇〇七年初夏。那时，他在我们昌平东部山区的一处山庄编辑修改《中国音乐文史》。受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朱明德同志的委托，我时常到他的住处去看望他老人家。就这样我们有了长时间的接触，越来越熟，以至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忘年交。

我很珍惜与周老的缘分。他常向他周围的朋友这样介绍我：“我俩都姓周，又是同行，我是下台的文联主席，他是在位的文联主席。”每次他说到这里，我就赶紧把话抢过来；“您可是中国文联的大主席，现在还是名誉主席呢，我这个小萝卜头哪能和您相提并论。”但不管怎么说，我们确实是同行，想的干的都是关于文艺发展的事情。

那一次，周老在昌平编辑和修改他的文稿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发现他始终是那么敬业，不辞辛苦，每天工作好几个小时，认真地编审稿件。我每次去看他，他就拿着他修改过的稿件给我讲，滔滔不绝，津津乐道。周老非常仁义，平易，吃住在那里，什么事都没有，不挑不拣，总是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工作人员说周老那么个大领导，没有一点架子，看上去就是一位慈祥的普通老人。

周老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以至那次离开昌平后，我非常想念和惦记他。于是，我就经常到他北京的家里去看他。每次到他家，他都非常热情，张罗保姆沏茶倒水，拿吃的，我受宠若惊。我特别喜欢和他聊天，他能从延安时期跨越式地聊到他当文化部长和当文联主席的每一阶段的经历。后来我才慢慢知道，老爷子这一生真了不起，做了很多大事、要事，创作了一大批经典文艺作品，他无愧于我国著名的音乐家、文艺理论家、编辑家、艺术教育家。他的书法也很见功夫，所以他还是书法大家。

我喜欢和周老深聊，他也愿意和我聊，周老这辈子对文学艺术有着特殊的情感与情结。我问周老，您说怎样做才能使文联的工作有声有色，富有成效？周老立马收起那脸微笑，非常严肃地对我说：“你作为文联主席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记住！一要交朋友，二要抓创作。”说完这句话，周老又笑了。他凝视我片刻，好像示意我对他讲的话要引起注意。而后，他慢慢谈开来。“交朋友，要交知心朋友，交真朋友，要用真心真情去交，不能华而不实。对人对事没有感情，怎么和谐？不和谐，就容易出问题。增加感情，是做好文化工作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交朋友，建立感情，可以从小处做起，比如哪位艺术家有困难时，问寒问暖，买些水果到家里看望一下，说说知心话，这些都很重要。有了和大伙的感情交流，再有什么活动、遇到什么事情就好办了。你不拿出真感情，不甘愿为人做事情，对方就很难信任你，就会与你有隔阂，工作起来也不会那么和谐。文联主席，是个职务，不要把主席这个称谓太当回事。当回事，你就会往上飘，就会摆官谱，打官腔，就会脱离群众，远离艺术家，这样自然不容易与他们建立感情。我反对别人称呼我的头衔，局长、部长、主席什么的，我都不喜欢听，叫我老周或周老都行，就是不爱听那些官称。跟过我的有八九任秘书，所有的秘书，都没喊过我官衔，就叫我巍峙同志，这样不是挺好吗！习惯了彼此都很轻松，感觉也特别好。什么事情都有一个情字在先，过去我的朋友很多，可以说门庭若市，朋友多就是开展工作的资源，活儿多，工作多，不怕！那些都是靠人做出来的，有了一个情字在前，任何事情都好办，人都是讲感情的，你总是绷着脸，冷面孔，当然不会有好局面。”

周老一口气给我讲完了如何交朋友这个问题，他讲得非常自信，他说这是他十年文联主席的经验之谈。他敏捷的思维和不打磕巴的语速让我惊讶，因为他毕竟是九十多岁的老人了，他讲的，都是他做过的，是他的切身感受。

当他谈到“抓创作”这个问题的时候，老人打着手势，更是一板一眼：“文联的工作，抓创作是根本，是关键。要想有作为，就要围绕主旋律，不断创作出好作品。一部好的作品，能鼓舞人，激励人，能荡涤人的心灵，给人以力量，抓创作是文艺工作者的生命线。文联的使命，就是要做好这项工作。好的作品具有极高的精神价值。战争年代，虽然苦，天天流血牺牲，但那时我们有一大批优秀作品支撑着我们官兵的精神斗志，我们的战士打起仗来，个个都勇往直前，不畏流血牺牲。为什么能这样呢？就是因为有好的作品在激励着我们。当时的敌后也是一样，工作、生活一样艰苦，没有粮食，没有基本的生活用品，盐都没有。虽然艰苦，但搞起文艺演出来，文艺队的战士们就有精神，老百姓也高兴。每次观看演出，大人小孩就爬到树上去看，由于他们长期缺乏营养，体质弱，看着看着，就从树上掉了下来，累得不行，就躺在地上，继续和战士们一起唱歌，这说明好的作品能鼓舞人，能激励人，能给人以无尽的力量。我们的文艺战士，行军途中，顶着瓢泼大雨，路上仍高唱国际歌，唱起歌来，精神立刻就不一样。这个东西，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但处处存在，这就是好作品的无穷魅力与震撼力。所以，我一直倡导，文联必须要紧紧围绕主旋律，多搞创作，激励创作，鼓励创作。文联的职能好比园丁，要及时为艺术家及他们的作品施肥、浇水、剪枝，为艺术家搭好平台，建好园地，搞好服务，文联要真正成为艺术家之家。”

这些年来，我一直按照周老谈的这两点，去探索和推进文联工作。他的观点、见地，都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对我们开展工作起到了非常好的推动作用。

昌平文联作为昌平区委、区政府联系艺术家和艺术界的桥梁和纽带，肩负着发展和壮大本地文学艺术事业的重任。为了给艺术家们搭好平台，建好园地，搞好服务，文联创办了“一报一刊”，即《昌平周刊》“叠翠副刊”和《昌平文艺》季刊，就是要为创作提供保障。作为总编的我，总想让全国的“大家”们和“名人”们为昌平、为我的家乡题写一些寄语和希望，一方面激励文学艺术工作者，一方面以宣传扩大昌平的对外影响，提高知名度和美誉度。这方面，老爷子我也没放过。但他毕竟已那么大年纪，手头还有那么多要干的事，我实在不忍心、不好意思劳驾他老人家。想让他题字我憋了好几天，最后还是硬着头皮和周老说了我的意思。至于题什么，老爷子随便。于是我把我那本“名人签字簿”递给了周老，没想到他答应得非常痛快，执意要用毛笔和宣纸，书写他对昌平的切身感受和印象。在他眼中，昌平的青山好，昌平的空气好，昌平的环境好，昌平的景色好，昌平像是一幅画，于是周老便书写了“昌平如画”四个字。后来的日子里，周老还为昌平题写了“昌平南环大桥”“昌平文联”“昌平文艺”“昌平老干部”“德法并举”等，为我们昌平留下了很多他的墨宝，这让我非常感动，他对昌平有着特殊的感情。

这两年，周老更加关注昌平文联的发展建设，他鼓励我们说：“昌平的文风正，文气浓！”。我听了周老这样评价昌平，非常高兴，也非常受鼓舞。其实我感觉我们的工作比起先进区县差得还很远，很多地方还需要虚心向人家学习。总而言之有周老的鼓励，我们会努力的，一直像他说的那样做下去。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昌平文联召开大会，我当然强烈地想邀请老人家出席，但考虑到他那么大年纪，实在不好意思张嘴。我只是试着说了一句请他来出席大会，没想到老爷子欣然接受，对我说：“大会可以出席，但不讲话。”我连声答应：“不讲，不讲，您出席就行了。”周老为了出席这次大会，头天晚上就赶到了昌平，当司机从汽车后备箱取东西时，我发现还给老爷子带着氧气瓶，这让我更加感动，大冷的天，老爷子出来一次真的不容易。难怪同时出席大会的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著名评书艺术家刘兰芳老师风趣地对我说：“振华，你怎么把文联的老祖宗给请来了？”我说：“周老一直关注昌平，关心昌平，他可是我们昌平文学艺术事业的大靠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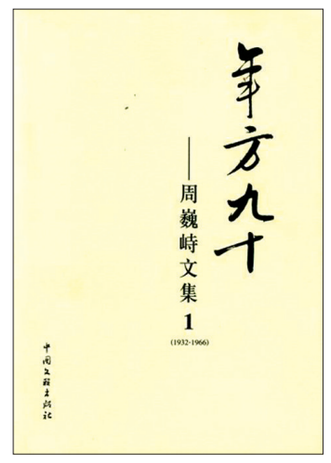
我发现每次和周老聊天的时候，他都很兴奋，因为他的话题讲的都是他的革命生涯。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就协助戈公振、李公朴、邹韬奋、陶行知等爱国人士从事进步出版工作，积极参与群众救亡运动，是上海救亡歌咏运动的先行者和组织者之一，并与音乐家吕骥、冼星海等人共同推动了运动的发展和深入。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参加了八路军，继作家丁玲后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当谈到他在延安时期的那段经历，谈到周总理怎么关心文学艺术创作时，更是情深意切，言语中充满了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周老对我说，周总理生前，一共找过他四十八次，但多数是在深夜，一般是给他打电话。周老说总理从来不让秘书代打，说到这里时，周老开始模仿总理的口气：“周巍峙！我是恩来呀。”学完后，周老的表情特别幸福。一九六四年，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十五周年，周总理提议创作一部大型歌舞作品以歌颂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的光辉历程，并点将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的周巍峙任总指挥之一。《东方红》的创作是舞台艺术的大会战，周巍峙不仅具体筹划从各地调集各类人才，还参与了这台歌舞的构思、创作，是首要的负责人之一。《东方红》的演出，得到了毛主席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周总理在一次谈话时对周巍峙说：我是政府的总理，你是文艺的总理。周总理对周巍峙充满了信任和关怀。“文革”期间，周总理先后保了周巍峙夫妇三次。一九六九年周老和老伴王昆被下放到湖北咸宁文化部的“五七干校”，那段日子什么活都干，养猪、喂鸭、看牛及各种农活，后来同事和他开玩笑，你再写一首“鸭司令进行曲”吧！在干校期间，周老一直保持着乐观的心态，还经常给老伴做思想工作。王昆有过三次轻生的念头，周老对老伴说：“再委屈也不能死，一是死了我们的事情永远就搞不清了，二是我们的孩子怎么办？”在周老的关心和呵护下，老伴终于挺了过来。

自新中国成立后，周老长期担任文化艺术领域重要领导职务，在长达七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为保护和发扬民族民间优秀文化传统，做出了重要贡献。尽管如此，提到周巍峙这个名字，起初我们昌平有很多人并不熟悉，甚至我也是一知半解。但提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大人小孩都知道。“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这首脍炙人口、大气磅礴、激情四溢，曾激励过百万志愿军战士奔赴前线的歌曲，就是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周巍峙谱写的曲子。我问周老，您怎么写出来这么经典的曲子？他说：“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南夹道田汉居所，人民日报、新华半月刊两个单位召集作品研讨会，在别人汇报的时候，我只用了半个小时，就写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这首曲子。”他说，当时在创作这首曲子时，有一种强烈的冲动，那时，他本人和整个国家刚刚从战争中走出来，战争的体验仍没有淡忘，对八路军、解放军的战斗和生活都很熟悉，当时毛泽东和中央做出的决策非常急迫，我们的部队突然改变任务，这一切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大的背景，所以作品在半小时内就一气呵成，就这么简单。周老说得很轻松，试想，没有强烈的爱国情怀，没有勇于牺牲的精神，没有保家卫国的强烈使命，创作灵感从何而来，激情怎么能够迸发出来？

周老八十岁时当选为中国文联主席，九十岁时才退下来。说是退休，周老一直也没闲着，仍在发挥着火样的余热，现在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两三点钟，爬成千上万字的格子。九十岁时，出版了《年方九十——周巍峙文集》。我和他相识的四年来，亲眼目睹了周老的如何敬业，他的桌上，总放着厚厚一摞书稿，不时翻阅着。我每次去看他时，他就让我看他修改过的文字，一边讲，一边给我细细地解释。我看着老人家修改过的大量文稿，非常惊讶，由衷地敬重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我问他，您这么大年龄，怎么还做这么多工作，身体吃得消吗？他一笑，冲着我说：“习惯了，没有事干，不自在。”周老看上去神采奕奕，气色非凡，让你感到他充满童心的世界。我又问，您老的长寿秘诀是什么？他又一笑，风趣地说：“我的秘诀就是“五不想”，不想名、不想利、不想病、不想老、不想死。这五个东西，都不是太好的东西，所以不要想它们，想哪一个都不好，一块儿想，这个人就完了，也就没心思干事情了。”

周老，这位“德艺双馨”的老文艺工作者，从他身上我学到了很多闪光的东西。“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衷心祝愿周老健康长寿，艺术生命常青，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续写新的历史篇章。您的墨宝我们会珍藏起来，相信它会永远激励昌平人民把昌平建设得更加美丽。







作者与周巍峙、王昆夫妇合影

我眼中的两位老先生

赖永海

任继愈先生

一九七八年，国家实行新的学位制度，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我有幸跻身任继愈先生门下，成为先生的众多弟子之一。

当时我在《中山大学学报》当编辑，记得在报考研究生时，曾征求一位老师的意见，他很诚挚地谈了自己的看法：第一，任先生是大家，能考上他的研究生，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但正因为他是大家，考上的难度相对会大一些，这一点要有思想准备；第二，听说任先生眼睛不太好，加之事务十分繁忙，考取之后可以得到先生多少具体指导不太好说。我非常感谢这位老师的意见，但我还是坚持了原先的想法。也许是命运之神的关照，我有幸被录取了。

在读三年，先生为我们开设了《佛教概论》、《佛经选读》、《史料学》等多门课程。也许是长期形成的习惯，先生上课之认真、严谨，让我们这些经过“文革”的人非常出乎意料。听了不少“天马行空”的课，刚开始听先生那样有板有眼的课，还有点不太习惯。先生讲课，不但有完整的讲义，而且有些课（如《佛经选读》等）还预先把所读经典印发给我们，让我们先预习。而《佛教概论》一课之系统、深入，更让我们这些初学者如醍醐灌顶，大至思想之剖析，小至佛教名相之阐述，既细致入微，又深入浅出；既有哲学家的高屋建瓴，又有学问家的严谨和缜密。我后来走上佛教研究之路，完全得益于先生的启蒙、点化。

俗话说：“师父带进门，修行在个人。”但是师父是如何“带进门”的，事实上却千差万别。毛主席曾称赞任先生是“风毛麟角”，应该说主要是称赞其具有较科学的研究方法。先生指导研究生，也很注重对学生进行思路和方法上的训练。他经常对我们说：要进行中国哲学和佛学的研究，有两个方面的准备是不可或缺的，一是理论的训练，二是资料的准备。理论是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好的工具，出不了高品质的产品。而资料有如原材料，没有充足、上乘的原材料，“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不管是理论的训练还是资料的准备，都得下硬功夫、苦功夫，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

如果说硕士生阶段我对先生的传道授业还停留在一般性的感受，那么，到了博士生阶段，特别是博士论文的写作，我的感受从“一般”上升到了“具体”。我是先生的第一个博士生，毕业论文的题目是《中国佛性论》，全文近三十万字。当时（一九八五年）还没用电脑写作，我的论文是用每页三百字的稿纸写的，全篇近一千页。先生的眼睛本来就不太好，当我把这近一千页的文稿交给先生时，我的内心真的有点忐忑不安，担心这太为难乃至折磨先生了。可是，当先生把审读后的论文还给我时，我深深地被“震撼”了！近一千页的稿纸上，几乎每页都留下了先生的印记，大至文句的修润，小至标点符号的改正，可以想象，先生为我的这篇论文所付出的劳动，是何等的艰辛！他对学生极端负责任的态度和精神，确是我们今天指导研究生的楷模。论文付梓时，先生又亲自为论文赐序，说了许多褒奖和鼓励后学的话，作为一名学生，能遇到这样的老师，夫复何求？

先生待人，非常的真诚实在，不喜欢做表面文章。他说话不多，更不喜欢当面说好话，但他在背后为人所说的好话和所做的好事，大概有许多当事人至今仍不知晓。他长期奉行的“四不”原则（即不赴宴、不过生日、不出全集和不当挂名主编），更是常人所难做到的。对于“不过生日”，我亲历其事。他八十大寿前夕，我与几个同学商量如何为先生开一个学术研讨会，出一个集子，以志纪念，没想到几次与先生谈及此事，先生都断然拒绝。他半开玩笑地说，等九十岁再说吧。到了临近九十岁时，我们几个学生重提此事，他还是那种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至于“不当挂名主编”，许多参与先生编书的学者都有切身体会。我曾参加了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第四卷）的编撰工作，先生一丝不苟的精神着实让人赞叹。从总体的编写思路到具体的篇章结构，先生都事必躬亲自不待言，文稿交上去后，他都要逐章逐字进行审读和修改，处处体现出视学术为生命的学者本色。

季羡林先生

我不是季羡林先生的入室弟子，但季老绝对是一位让我永志难忘的恩师。

二十年前，我同许多中青年学者一样，对季先生其人其学，除了景仰、崇敬之外，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

我认识季先生，缘于我的一本小书——《佛道诗禅》。书是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潘平是该书的责任编辑。一九九〇年底我到北京开会，正好该书刚印出来。有一天，我俩到北京大学办事，潘平说他知道季老的家庭地址，就提议一起去看看季老，顺便送一本《佛道诗禅》给他。我说那太好啦。我俩就这样贸然登门造访了。当我们轻轻敲开先生的门，先生不但没有责怪我们的冒失，而且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两位不速之客。进门坐定后，我们向先生自报家门和说明来意：主要是来看看他，并送他一本最近刚出版的小书，请他指教。先生听后，说了一句令我十分吃惊的话，他说：“我正在读你写的《中国佛性论》。”并指着放在桌上的一本已经看了大半且书中夹了许多纸条的书。老人家说：“你的书写得不错，是刚从街上买来的。”听了季老这一番话，我一时受宠若惊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们同季老聊了一会儿，老人家又带我俩去参观他的书房，从书房出来后，我们请他老人家回屋休息，他说要陪我们往校园里走走，而且走得很远很远。

我第二次去见季老，是想向他老人家要一篇文章，为我主编的《禅学研究》撑门面。这个想法确实有点过于大胆，但转而又想，季老人这么好，说不定他老人家慈悲，真的能遂了我的心愿。结果怎么样呢？下面是季老特地为《禅学研究》撰写的《所谓中天音旨》一文的开头语：

月前，南京大学哲学系的赖永海教授来舍下。看到了一篇文章（指季老原来“应韩国东国大学吴亨根教授之邀，为当时校长李智冠教授祝寿”所写的《梵语佛典及汉译佛典中四流音问题》一文），产生了兴趣，撺掇我把文章交给他，在他们新创办的《禅学研究》杂志上发表。我动了心，觉得应该对他们这一桩在荒漠上开辟绿洲的盛举呐喊两声，尽上绵薄，聊示随喜之微意。但是继而一想，又觉不妥，此文版权已交台湾，一女两嫁，似有违碍。我之进退，实为狼狈。经我再三考虑，忽然灵机一动，豁然开朗，似有天助，此文虽已长达两万余言，实为一“未完成之杰作”。原来的写作计划中尚有“关于中天音旨”一章。现在永海兄索稿，使我身处夹道之内，何不补成此章，了此宿愿，又不辜负《禅学研究》之期望。（载于一九九四年出版的《禅学研究》第二辑）

看了这一段话，对于季先生淳厚慈悲的为人和乐于奖掖提携后学的长者风范，大概无须我再说什么了。

更让我感动的还有先生长期以来对我的《中国佛性论》和《佛道诗禅》等著作的关注和褒奖，有几次我都是从别人口中得到这个信息的。我的一个学生叫圣凯，曾经与湛如法师一起到301医院去看望季先生，先生听说圣凯是我的学生，就对圣凯说：“赖永海的《中国佛性论》写得非常不错。”我有时在想：先生如此待我，真不知道是我的运气好，还是先生的为人好。实际上，与我有着相同境遇与感受的年轻学者应该还有许多，也许先生自己不知道，他对晚辈后学的这种慈父般的关爱和呵护，给了这些年轻学者们多大的激励、鼓舞和精神力量啊！

■ 中国文化报社主办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15号 邮政编码:100013 传真:(010)64208704 电话:总编室(010)64275044 新闻中心(010)64274856 通联发行(010)64298092 广告部(010)64293890
本报所付稿酬包括作品数字化和信息网络传播的报酬 网址:http//www.ccdy.cn 经营管理(010)64298584 本报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0115号(1-1) 订阅:各地邮局 零售每份1.00元 解放军报印刷厂印刷